

序跋精萃

超越生与死的是诗

王蒙

如果说此生有过一些独到的、温暖的、令人珍惜眷恋的经验，如果说这样的经验让我感觉到了生命与情感，让我感觉到爱与幸福，让我感觉到世上有比千疮百孔的自身更美好得多的一切，如果你说在个体生命将要结束的那一刻，仍然会有令你安慰与沉醉，充实与自信，超越与救赎，使你足以面对死神而微笑的那个存在，它就是诗，它就是写诗的经验，而且常常是写新诗的经验。

如果说有那么一些最最揪心的经验你觉得难以倾吐却又必须写下，你只能写诗，而且是新诗。

读写中华诗词的时候你攀登行进在中华文化的大山大川上，你试图在中华文化参天大树上绿开一片小小的树叶。读写新诗的时候，你溶化在你正在得到的或许是独特的感动里。而超越这一切甚至超越生死得失的是不分新体与旧体的所有的诗。

感动是人生的最大最强的意义与归结。

我总算写了诗，享受过人生的这一峰峦。

只在新诗集里，有我的它处没有的多维码与秘密，我相信与我心心相印的读者，总会找出它们的谜底。

(本文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新版《王蒙的诗》前言)

7月24日早晨，从呼人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就足以推想这一整天的酷热。我在酒店门口犹豫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后退。我没有后退。线路在凌晨第一次惊醒的时候就已经确定：沿延安中路东行至第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左转沿石门一路北行至下一个丁字路口，横过斑马线，进入大沽路，再朝东行大约六十米，右转进入目的地。

目的地是一个半月前的意外发现。那是我第一次从蒙特利尔直飞上海后的第二天清早。黑白颠倒的感觉不知怎么就将我带到了大沽路菜市场的入口。刚走下进场的阶梯，五官居然立刻各就其位：抚弄着菜叶上的水滴，呼吸着空气里的生机，观察着摊贩们的举止，品味着顾客们的神情，倾听着络绎不绝的方言……时差顿时烟消云散。我好像已经在上海生活很多年了，而不是刚刚来自它位于加拿大的“友好城市”，仅仅是这座城市里的匆匆过客。

特别是那络绎不绝的方言！那鲜活无比的方言！我从来都相信，方言不仅是任何一座城市里最突出的“地标”，也是任何一座城市最纯洁的“天性”。

每次回到祖国，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而每次来到一座熟悉或者陌生的城市，我总是会去寻找方言最活跃的地段和场所。一旦找到，不仅会有强烈的“成就感”，还会有强烈的“存在感”。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方言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所有城市的所有公共空间里退却。我的这种寻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甚至在我的故乡长沙，都已经不怎么能够听到标准的湖南话……与很多有心人一样，我也相信，现在已经到要“救救方言”的时候了。

像上一次那样绕菜市场走了两圈，

也像上一次那样任五官全面开放。但是，“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我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两次进入的许多不同。上一次，我是在漫无目的的行走中意外地来到了菜市场的人口，而这一次，它已经是我明确的目的地；上一次，我是在走“进”菜市场之后才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当地人，而这一次，我在走“向”它的时候就已经有当地人的感觉。更重要的，上一次，我是在抵达祖国的第二天走进的，而这一次，却是在又一次即将离开的前一天……这些年来，过频的抵达和离开让我的身心有点疲惫了，让我的心有点厌倦了。这疲惫和厌倦也许就是越来越羡慕甚至越来越嫉妒方言的原因。它居然一直与“原配”的疆域纠缠得那么融洽，厮守得那么默契，依恋得那么痴迷。它居然总是那样从容、那样安稳、那样自信。

我带着淡淡的伤感离开菜市场。而大沽路口那些卖早点的店铺和买早点的顾客又让我这伤感带上了一丝悔意。我后悔没有提醒朋友在订酒店的时候应该不“包早餐”。那样，我便像当地人一样在街边的小店用舌尖去品味上海的早晨。作为补偿，在横过石门一路之后，我决定不从原路返回，而是从面对大沽路的小区穿过。我相信这样的路线会让我看到更多的世态人情……右转弯再左转弯再左转弯再右转弯再右转弯，地气缭绕的曲线果然将我带回到了酒店的门口。

吃过无聊的自助早餐，我重新走进上海的早晨。与刚才相反，我首先沿延安中路西行至十字路口，然后从延安中路高架桥下横过进入茂名南路。位于巨鹿路上的目的地在这次回国之前就已经确定。不过，已经被不断刺激的好奇让我决定绕行而不是直达。所以我

没有在路口右转，而是横过巨鹿路，继续南行。没走出几步，看见一辆接送顾客的小巴在前方的公交汽车站停下了下来。三位老人从车上下来。他们一位提着购物袋，两位拖着购物车。他们意犹未尽，继续站在路边旁若无人地用方言大声交谈。这怡然自得的场面为我确定了一个特别的节目。下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一定要像这些老人一样，坐着接送顾客的小巴去逛一个更加“当地”的市场。

继续向南。继续全神贯注。在接近长乐路口的地方，对面那家名为“滴水洞”的湖南餐馆当然会激起我的亲情。我是昨天乘坐最早的那班高铁从长沙赶往上海的，到现在差不多只是过去了一整天。而我在回加拿大之前突然绕道长沙，是为了重温四十五前的一次火车旅行，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火车旅行。那是1971年春节的前夕。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在长沙火车站上车，去与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父亲团聚。那天下着大雪。我们在衡山站下车的时候已经完全天黑。我们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清早，我们先乘汽车到衡东县，再换乘汽车到草市镇。然后，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乘小舟渡过米河，再踏着厚厚的积雪前往营地……我记得所有的这一切。我还记得在离我们过夜的那家招待所不远的那家供销社里，我让母亲为我买了一生中买的第一本书——连环画《我要读书》。对我这个以书为生的人，这样的第一本书似乎有宿命的意义。

我紧张地将目光收回来，好像是不想被乡愁带到更远的地方。但是，兰心大戏院却让我的思路更加跳跃。建筑正面关于“优秀历史建筑”的介绍说明它是三十年代初由“英国侨民”建造的剧院。“英国”和“侨民”对我都是敏感的词汇，因为我们家的血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延伸至英国，而我自己现在也已经变成了美联邦国家的侨民。还有，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已经是莎士比亚的铁粉。与英语相关的剧院必定引起我的兴趣。我兴奋地抚摸着兰心的大门，想象着三十年代初的英国侨民穿过夜上海的繁华走进这座用伦敦著名剧院的名字来命名的“异域的迷宫”的心情和表情……语言是文学的祖国。我好像听到了麦克白斯在戏院舞台上激情的独白：“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这揪心的幻觉提醒我真实的明天又是一个“离开”的日子。这些年来，太多的抵达和离开……太多的无法抵达和无法离开……我的确已经有点疲惫和厌倦了。

消沉的思绪让我不知道应该继续向南还是转而沿长乐路东行。犹豫之中，与兰心大戏院成对角线方向的那座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横过长乐路又横过茂名南路，走进那座标有“锦江旅游”字样的大楼。

没有想到，从旋转门一进去就已经是正式的办公区域。我不敢意思马上退出，只好尴尬地侧身面对着入口旁边的资料架，假装在挑选资料。很快，摆放在资料架最底层的那三本主题为《斯德哥尔摩》的宣传册进入了我的视线。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在离开长沙的前一天晚上，我刚收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邮件，得知《空巢》的瑞典文版已经印好，很快就会上市。我突然好像明白了这座建筑吸引我进入的原因。于是，假戏真做，拿起一本宣传册。可笑的是，这只是一本介绍斯德哥尔摩的名品店的宣传册，从头翻到尾，我没有发现一丝文学的气息。我调侃了一下自己原来将斯德哥尔摩视为文学的圣殿，没有想到它同样是购物的天堂。我接着又想，有能力购买指南中那些名品的中国游客是不大可能有兴趣购买一本译成瑞典文的中国小说的。也就是说，这本“斯德哥尔摩着华指南”其实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还是决定收藏一本：作为自己第一部瑞典文译本即将上市的纪念；作为自己在上海的早晨与斯德哥尔摩相遇的纪念。

继续南行一小段，出现在身边的大花园和花园北端的老建筑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从敞开的侧门走进。走到老建筑的跟前，看到了“花园饭馆”的标志，想着自然不会再出现进刚那座办公楼时的尴尬了，就从从容地走了进去。但是，刚进到大堂，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尴尬：怎么回事，怎么住家与住客之间，住客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交谈都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外语？这一次，语言带给我的不是热烈的美感，而是隐隐的不安。尽管大家都轻声细语，尽管大家都彬彬有礼，这意想不到的语境还是令我很不自在。我没有再往里走了。我突然想起了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那是一部聚焦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侨

民在上海的特殊经历的影片。那些曾经颇有优越感的侨民被日军从租界驱赶到了“集中营”里，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包括“自由”在内的一切。我很想知道，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里，我眼前的这家饭店为谁拥有，作何用途；还有我刚刚经过的那家曾经属于英国侨民的剧院在沦陷的上海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绕花园里的喷水池转了一圈之后，还是从进来的那个侧门出去，还是沿茂名南路南行。气温仍在上升，情绪却继续低落……

这时候，前方一个公用电话亭进入了我的视线。它伫立在淮海中路旁边。我走过去，我走进去，我拿起电话筒，我插入IC卡，我按下深圳的区号和一个座机的号码……“空巢”中的母亲很快就接起了电话。她问我昨天晚上在大众书局做的活动进行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她问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有酷热的感觉（她刚才从电视里看到了关于上海这些天持续高温的报道）。我说还好。接着我告诉她，起来之后我一直都在外面走，上海的早晨真是很有意思。说到这里，我顺口许诺将来一定要带她再来上海看看。语音未落，淡淡的伤感又从心底渗出。最近几次看见母亲，有不少的迹象都在提醒我，属于她的将来已经不会太长……我真不知道这简单的许诺是否真能够兑现。我知道母亲至今只到过一次上海。那是在1966年11月的中旬，她作为“革命教师”代表之一被她任教的周南中学（杨开慧和向警予等人的母校）派往上海考察当地的“革命形势”。重大的责任并没有让她忘记自己幼小的孩子。她带回了一个精致的饼干桶。那个一直与我们生活了三十年的饼干桶不仅让我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对我有了感觉，也让对上海的感觉成为我一生中最初的记忆。我很高兴母亲又提起了那个饼干桶。这引诱我想去挖出她唯一一次上海之行的更多记忆。她想了想，说她只记得她们一行当时是在淮海中路上的一个弄里弄。这又是多么神奇的巧合啊！我现在也正好是站在淮海中路路上，与母亲的记忆相隔将近五十一年。

从公用电话亭出来，我沿淮海中路西行至下一个路口，右转进入陕西南路，北行至下一个路口，左转弯过马路进入长乐路，西行至下一个路口，右转弯横过马路沿襄阳北路北行至巨鹿路。无意中看到了巨鹿路菜市场，忍不住又进去转了一圈，然后直奔我的目的地。

“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所在地）曾经是令我神魂颠倒的地址。对它的想象和向往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而2012年5月19日，经过三十多年的等待，我终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第一次走进了那个地址。那一天，上海三家出版社在那里联合主办了我同时出版的五本新书的发布会。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新书发布会”，它拉开了我随后五年的文学活动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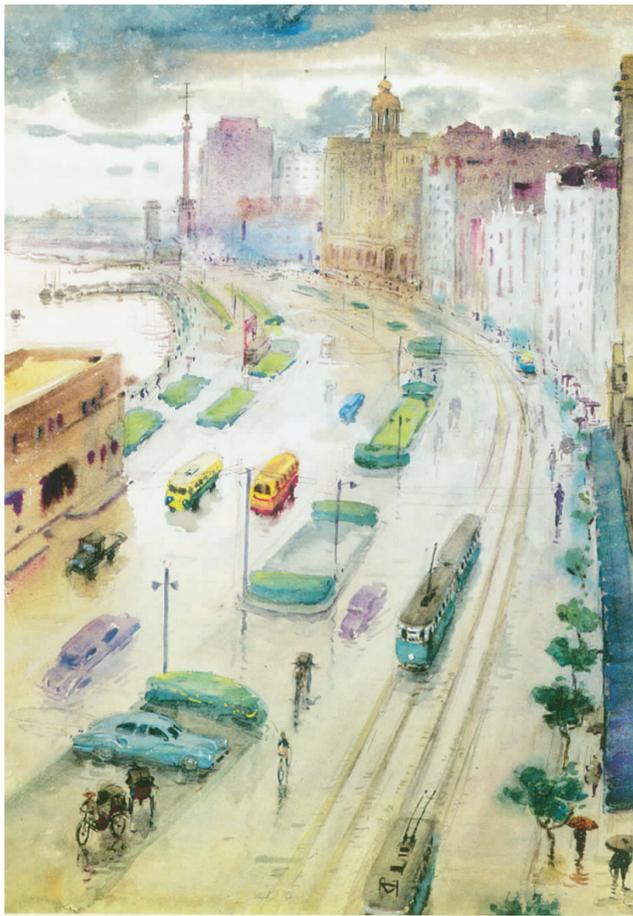
但是又经过了整整四年，又经过了一连串偶然的事件，我才对那个地址里的宿命气息有了更彻底的感知。去年在上海参加书展的时候，我偶然决定去和平饭店（沙逊大厦）看看。在里面逛着逛着，我偶然走上一段很不起眼的楼梯，进到了陈列店史又兼卖纪念品的房间。在那里转了一圈之后，我偶然看到了书架上的那一套“城市行走书系”（同济大学出版社）。它小巧的开本、精美的制作和双语的解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偶然决定买下其中那一本《上海鄂达克建筑地图》。回到蒙特利尔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老朋友卡罗尔从医院做义工回来，路过我的住处，我将书借给了她。再次见面的时候，她偶然提及书中一幢建筑的主人死后葬在了蒙特利尔。这细节令我好奇。我请卡罗尔为我找到是哪一幢建筑。她翻动着书页，翻着翻着翻到了书的第130页。我惊呆了。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我在新书发布会后接受采访的花园。

我相继读完了两种语言的解说。它们并不完全对应。比如关于主人最后的归属汉语的解说就没有提及。当然，两个版本都介绍了整幢建筑与罗马神话中丘比特和普洛克爱情故事之间的关系以及逆光矗立在“爱神”花园水池中央的普洛克雕像在“浩劫”而幸存的传奇。

我可能想不到从少年时代起就令我神魂颠倒的地址后来会成为我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路标，我也不可能想到这路标的源头深藏着一段浪漫又传奇的故事，我更不可能想到这故事里的主人公最后会终结于我现在生活的异域。从我住处的阳台上，可以眺望蒙特利尔最大的墓地。我猜想，有一天我能够在那里找到“巨鹿路675号”的起源。

所以，我走近了这另一个目的地。保安问我来干什么。我不能说是来“敬神”，只能说是来“找人”。我说出那一连串名字足以证明我进入这个地址的合法性。保安说他们不会这么早来上班，看样子是要将我拒之门外。我只好改回包抄为正面进攻，问他能不能让我去办公楼后面的花园看看。保安好像是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请求又好像是有点吃惊我对环境的熟悉，没有给出答复。我将他的沉默解释成他放弃了他的世俗权力。

时隔五年两个月零四天，我又回到了普洛克的视线之中。这位在神话里为寻找自己的“爱神”而历经千辛万苦的少女！我开始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重新回到这里或者自己走了多远才重新回到了这里……可是，在我们的目光相互接触的一刹那，我知道什么都不需要说了。她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这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源于“爱”，因为那就是“爱”。



笔会

雨中外滩（水彩画）

哈定

2016年笔会文粹《今生一盅茶》出版

2016年笔会文粹《今生一盅茶》已于日前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杨绛《师生姊妹之作》、葛兆光《陆谷孙先生》、黄永玉《一梦到西塘》等多篇名家大家的散文佳作。去年也是笔会副刊创刊七十周年，书中第五辑特别收录了孙郁《中国的副刊，应当是这个样子》、李皖《在笔会窗口眺望》、王为松《一读四十年》等相关文字。

——编者



每天要走的那条公园小路，有一阵出现了问题。我当初选择在那个小镇租房，就因为有条穿过公园直达市内的捷径，这样到我的工作地点，步行半个小时即可，沿途绿树黄花、小桥流水，野趣盎然。没想到刚搬过去半个月，牛津下了场大雨，把公园里的那条小路给淹了。水虽然不深，刚没脚膝，但步行显然是过不去了。而此路不通，就只能绕行公园外的大路，那距离就大大增加了，要一个半小时才能走到研究所。如不绕道，还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骑自行车冲过去——临近水洼，猛蹬几下，两脚高高扬起，十几米的水洼就一閃而过了。可是在英国骑自行车规矩太多，且已入法，比如必须戴头盔、穿反光衣，配前后车灯、甚至脚蹬子上都要有反光装置，交警随时检查，不合格会被罚款，如此麻烦，所以骑自行车也令人望而却步了。最后我只好绕远道跑了半个月。这说在小镇住的人也不少，每天像我说走这条路的人也不少，这样的问题显然也不是偶尔出现，为何公园当局就不能把小路修整一下，以便行人呢？这话看似有理，但你是固执己见就错了，因为你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而公园当局考虑的则是一旦把小路抬高、水流阻隔，小路旁边的沼泽就会缺水干涸，路边的芦苇就会枯死，水中的生物、小鱼、青蛙等等就会陷入绝境，河里的野鸭子的快乐生活也就走到尽头了……总之，在人的能力已充分提高，可以轻易改造自然的现代，是否还能成为沉默的自然的存在留出位置，对自己作为主体之外的他们保持一种谦让态度，可以为但有所不为，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品味牛津

耿传明

心，牛津大学由三十几个高度自治的学院组成，教学的总体安排由大学负责，但招生等工作都由各学院自主。这是一种先有学院，后有大学可称为独立联邦制大学的办学方式，英国目前仅存三所大学还使用这种模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杜伦大学，这三所学校都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

我所在的研究所的老师也来自于专业相关的各个学院，我的导师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教授，曾带我去她们学院参观。她所在的学院建于十七世纪初期，大致与莎士比亚同时期，四百多年校史，在牛津还不算太老的学院。该校是当时的一对贵族夫妇捐建的，丈夫去世后，由其遗孀接力建成。学院对师生可谓体贴入微，建校之初就建了一个供教授们专用的小花园，沿用至今，门锁还是中世纪样式的老锁，导师开了半天，才把它捅开。门上有个牌子声明：此花园属于“strictly privacy”（严格的私人场所），严禁外人进入。小花园里花团锦簇，绿草如茵，幽静、典雅，平常也很少有人光顾。学院还有免费的午餐和晚餐，教授可以带着自己的学生和女朋友去吃饭，顺便讨论问题。关于这个学院还流传有这么一个故事：四百多年前学校初建时，礼堂用的梁柱等全取材于数百年才能长成的厚重、坚硬、光洁的橡木，非常气派。过了三百多年，这些

橡木梁柱已经老朽，需要更换了，但要修旧如旧，到哪里去找这些百年才能成材的橡木？正在校方一筹莫展之际，负责校史档案的职员提供了一个线索：当年的学校捐助者给后人留下一封信，信中提到，捐助者当年在自己的庄园种下了几十棵橡树苗，现在三百年已经过去，正好成材，可满足需要。学校将信将疑，派人到贵族当年的庄园查看，果然发现了已成成材的三百多年的橡树苗。我曾问过导师这个传说的虚实，导师说她是二战后才来到牛津读书的，不知究竟，但是这类事情在牛津、剑桥乃至英国发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现在学院的财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数百年前校友、校友们捐赠的土地和财产，这些构成了学校存在的坚实的财务基础，没有这个做家底，要把非盈利的大学数百年地延续下去是不太可能的。的确，办一所大学不但需要恒产，更需要有恒心，需要一种超出一时一地，乃至超出自己这一代人需要的长远眼光。而对文明的守护与发展才是人类根本利益所在，相比之下，任何时代的功利需求比起这种永恒的需要逊色得多，因为它所营造、守护的是人类永久性的精神家园。

在英国生活期间，有时会遇到一些麻烦和不便。举个例子，我在牛津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